

# 从推理文学看平成时代的校园欺凌

——以《所罗门的伪证》等作品为例

王 涛

**内容提要** 通过分析宫部美雪、辻村深月、凑佳苗、武藤将吾等人描写平成时代不同时间段的推理作品，本文试图在梳理校园欺凌变化轨迹的同时，借助基拉尔的欲望介体和替罪羊理论为欺凌的生发机制提供一种解读。校园欺凌的背后或许是学级崩坏、格差社会等更深层问题，而推理文学所提供的成长模式虽无法根治校园欺凌这一现象，但对青壮年劳动力日趋匮乏的日本社会仍具备独特的参考价值。

**关键词** 推理文学 平成时代 校园欺凌 不登校 欲望介体 替罪羊 格差社会

“你们的同学走向了死亡，你们不想知道到底是为什么吗？”这是宫部美雪（宫部みゆき，1960—）的《所罗门的伪证》（『ソロモンの偽証』，2012，以下简称《所罗门》），辻村深月（1980—）的《时间停止的校园》（『冷たい校舎の時は止まる』，2004，以下简称《时间》），以及武藤将吾（1977—）编剧的推理剧《3年A班：从现在起，大家都是人质》（『3年A組-今から皆さんは、人質です-』，2019，以下简称《3年A班》）三部均以学生坠亡为谜面的推理作品给出的共同谜题。为解答谜题，三部作品中的主人公们采取了不同的行动：平成初期，十几个初中生组织了校内审判，以查明被校方和警方认定为自杀的同学的死亡真相（《所罗门》）；新世纪初，一众高中好友被困在时间停止的校园中，苦苦思考将他们困在这个精神世界中的到底是不是之前自杀的同学，以及他/她是否就在他们中间（《时间》）；平成时代终结前的一个月，看似懦弱的班主任竟将即将毕业的全班学生绑架，强迫他们随自己一起追查造成班级学生自杀的真凶（《3年A班》）。在解谜的过程中，校园欺凌毫无例外成为三宗散布在平成时代不同年代的坠亡事件的“头号凶嫌”。

校园“欺凌”（いじめ，又译“霸凌”）对平成时代究竟意味着什么？据官方统计，平

成元年（1989年）中小学中发生的校园欺凌事件为2.91万次，在少子化现象日趋严重、在籍学生整体趋势不断减少的背景下，这一数字却不断攀升，直至平成三十年（2018年）达到54.39万次。<sup>①</sup>若经由推理文学对校园欺凌问题提供的文学侧写<sup>②</sup>，到这触目惊心的数字变化背后一探究竟，对这个困扰了整个平成时代的社会问题，我们能否有些不同的认知呢？

### 一、“前科累累”的“嫌犯”：平成时代不断隐匿化、普遍化的校园欺凌

《所罗门》中，通过匿名信得知城东三中学生柏木卓也的坠亡事件后，茂木记者调查发现，事后的学校家长说明会上曾有家长提出卓也或许是因遭受欺凌才自杀的推测，并了解到曾与卓也发生冲突的大出俊次等三人团伙长期对学生们实施殴打、勒索一类的肢体欺凌，以及以辱骂嘲弄为主的言语欺凌。这令茂木联想到令自己开始关注校园问题的那桩欺凌自杀事件，而该事件又与现实中的校园欺凌首次通过媒体给社会造成巨大冲击的1986年东京富士见中学鹿川裕史自杀事件非常相似：受害学生均遭到班上学生们的残酷欺凌，班主任都在欺凌中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校方也都在事后不断推诿责任。<sup>③</sup>这一联想令茂木坚信是俊次等人的欺凌导致了卓也的坠亡，并坚持认为学校隐瞒了事实。然而，俊次等人虽早已成为少年科警察密切关注对象的不良少年，却与当时社会上真正的暴力团成员并无瓜葛，那些欺凌行为也很难正式立案。这一情形与现实中的鹿川事件都在提醒人们：校园欺凌与校园暴力不尽相同。

日本文部省1985年对欺凌最早给出的定义，与丹·奥维斯、法林顿等欧美学者的定义形成的共识包括：欺凌行为发生在身体、心理等方面有明显强弱差别的学生间，都是长期、反复的故意伤害<sup>④</sup>（《日》：12—13）。较之那些危及人身、财产安全，近乎犯

① 日本文部科学省「平成30年度児童生徒の問題行動・不登校等生徒指導上の諸課題に関する調査結果」、[https://www.mext.go.jp/component/a\\_menu/education/detail/\\_icsFiles/afieldfile/2019/10/25/1412082-30.pdf](https://www.mext.go.jp/component/a_menu/education/detail/_icsFiles/afieldfile/2019/10/25/1412082-30.pdf) [2021-07-21] 后文出自同一著作的引文，将随文标出该著名称首字和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

② 除推理文学外，无论是赤染晶子的《少女的告密》（『乙女の密告』，2010）、高桥弘希的《送火》（『送り火』，2018）这类荣获芥川奖的雅文学作品，还是吉谷实的漫画《白昼之雨》（2009—2010）、鸭志田一的轻小说《青春猪头少年系列》（2014—）、改编自大今良时漫画的动漫《声之形》（2016）等更为通俗化的作品，均涉及校园欺凌问题。但相比之下，推理文学更加雅俗共赏，更普遍地令读者与书中人物一起面临校园欺凌最严重的后果——死亡，且因体裁的缘故大多天生包含追根溯源的“叙事动因”。

③ 宫部美雪《所罗门的伪证》（I），徐建雄译，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20年，第328-329页。后文出自同一著作的引文，将随文标出该著名称首字和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史景轩《日本校园暴力及其演变》，河北教育出版社，2016年，第189-190页。后文出自同一著作的引文，将随文标出该著名称首字和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

④ Dan Olweus, *Bullying at School: What We Know and What We Can Do*,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ing, 1993, p. 9.

罪行为的传统校园暴力，欺凌更偏向于针对精神伤害的冷暴力，更具隐蔽性。两者间的关系既可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主张的那样理解为校园欺凌从属于校园暴力，也可以理解为是互有交叠的并列关系。<sup>①</sup>事实上，自1984年之后，日本传统的校园暴力便日趋沉寂，而以欺凌为代表的更隐蔽的恶性行为逐渐成为主流（《日》：188）。

在描写不同时代的推理文学中不难发现，平成时代“恶行累累”的校园欺凌行为，存在着一种不断隐匿化、普遍化的趋势<sup>②</sup>，且欺凌者大多认为自己只不过是“稍稍搞些恶作剧”（《所》Ⅲ：390）而已。在凑佳苗（湊かなえ，1973—）的《告白》（2008）、辻村深月的《时间》和《镜之孤城》（『かがみの孤城』，2017）等侧写新世纪初十年内情形的作品中，欺凌者已由俊次等人那样的小团体扩大为小圈子甚至全班，欺凌形式也从直接的勒索、殴打、谩骂，转为以损坏个人物品，散布谣言，书写、传播侮辱性文字等各种带有游戏形式的惩罚为主；卓也在学校中所遭受的孤立，也早已正式成为更为常见的社交欺凌，这种“群体无视”有时还会像《告白》中描绘的那样充当惩罚游戏的前奏。

21世纪最初几年，日本移动互联网得到了飞速发展，无论是上网速度、手机上网率在当时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凑佳苗的《少女》（2009）中，校内论坛上一句捕风捉影的话便足以引发欺凌，导致一名少女割腕自尽。及至平成时代即将终结时，社交网络上的欺凌更成为引发官方特别重视的欺凌形式。<sup>③</sup>《3年A班》中应对零奈自杀惨剧负责的人中，无论偷拍、造假及幕后操纵者，还是无数推波助澜、实施网暴的“键盘侠”，在行动过程中完全是匿名的，因而也就更加缺少顾忌。而且，网络欺凌除在时间空间上不再受限，也可能会改变以往欺凌者依靠体力、财力或地位而构成的传统强弱关系。

正因欺凌形式不断隐匿化，及至平成末期，60%以上的欺凌事件都是通过调查问卷和本人申诉才得以发现（「平」），造成的伤害也往往难以察验和鉴定。《3年A班》中的班主任柊一飒便以利刃刺入自己手背后流出的淋漓鲜血教育学生们：对受害者而言，轻率的几句话便堪比伤人利器，造成的心理伤害可能比直接的肢体暴力更令人不堪忍受。这些伤害在《所罗门》等作品中以抑郁不安、失语症、自律神经失调症、厌食呕吐，甚至一提到去学校就腹痛不止等生理形式体现出来，并由此经常引发“不登校”<sup>④</sup>的情

① 徐久生、徐隽颖《“校园暴力”与“校园欺凌”概念重塑》，载《青少年犯罪问题》2018年第6期，第48-49页。

② 本文中所涉及的推理作品都有意无意地隐匿了校园欺凌日益另一重要趋势——低龄化。2006年，发生在小学中的欺凌事件开始激增，到平成时代的最后几年甚至是初高中之和的两三倍（「平」）。

③ 以2018年为例，网络欺凌虽仅占已认知欺凌事件的3%，但也足有1.63万件，较上一年度增长近四千件（「平」）。

④ 日语中对“由于心理、情绪、身体或社会原因（疾病或经济原因除外）不（想）上学，一年间缺席达30天以上”行为的表达（「平」）。最早称为“拒学”，1992年改成强调心理抗拒性的“登校拒否”，1997年起改为沿用至今的中性表达“不登校”。

况。以《镜之孤城》为例，来到镜中城堡的初中生们其实是来自1985至2027年间不同年代的不登校孩子，他们大多遭遇了欺凌问题。然而在官方调查的不登校理由中，尽管确定由欺凌导致的情况长期占据相当比例<sup>①</sup>，却似乎始终远不及小说中描写的那样普遍。

而看似最易引发关注的欺凌导致自杀的情况中，在判定欺凌因素方面往往会面临更多困难，学校、警方和官方均会因认知困难、维护声誉、体制运转规律等因素，倾向于减少这方面的判定。<sup>②</sup>《所罗门》《时间》《3年A班》中坠亡的三位学生都被校方和警方定性为自杀，均未深究是否存在欺凌的因素；而对于学术研究者而言，较之单个书中人物死亡的真相，更重要的深一层真相是：校园欺凌为何会不断发生，且越来越严重？

## 二、内中介和替罪羊：对欺凌“动机”的一种人类学解读

推理文学中校园欺凌产生的原因看似多种多样，但宫部美雪借书中茂木记者之口做出的总结却甚为精到：集体对个人实施欺凌的“动因”，其实基本上都可归结为嫉恨和蔑视（《所》Ⅲ：119）。而这一观点又恰与法国理论家勒内·基拉尔（René Girard，1923—2015）关于欲望介体（*médiateur*）和替罪羊（*scapegoat*）的相关理论暗合。

在基拉尔看来，人的欲望其实并非根源于自身并为个人独有，而总是源自对一个既是楷模又是对手的介体之欲望的摹仿；摹仿者（主体），被摹仿者（介体）和欲望对象（客体）间构成了一种“三角”欲望关系，介体的影响会传递给作为欲望对象的客体，赋予其一种虚幻的价值，主体也会因此潜移默化地在自认为追求客体的过程中接受这种本不属于他的价值。<sup>③</sup>较之成年人，青少年更容易以身边人或亚文化群体为介体进行摹仿，如原发阶段的校园欺凌，就很可能有摹仿彼时正盛行的“不良文化”的因素。

① 以2018年为例，不登校人数已达16.45万，占较平成初年已减少近三分之一的在籍学生的1.7%，且其中六成是缺席90天以上的，不登校理由中近五分之一是“受同学关系困扰”，这其中又有近四分之三是指遭遇欺凌（「平」）。

② 平成三十年间由官方认定的校园欺凌自杀事件常为个位数（张挺、高杨《校园欺凌自杀与学校责任——基于日本1989—2018年民事裁判文书的分析》，载《比较教育研究》2021年第4期，第44-45页），但很难认为这是真实情况的体现。1986年鹿川一案便因自杀系发生于家中而在1991年被一审裁定为与欺凌无关，自杀与欺凌间的因果关系直至1994年才被东京高等法院认定（《日》：190）。但欺凌自杀事件一经认定，就往往会推动官方对欺凌认知的改进和相关立法的出台，如平成初期相关数据较低也有官方认知不足的因素使然，鹿川事件后，文部省也开始将校园欺凌与校园暴力区分开来，分别展开数据调查和相关防治工作，也正是在鹿川案终审的1994年，日本文部省在对欺凌的定性中取消了“并由学校确认为事实”一条，1997年以后，文部省将发生在校内外的欺凌事件都视为统计对象（《日》：13）。2013年通过的《校园欺凌防止对策推进法》也与2011年的滋贺县中学欺凌自杀事件存在一定关联。

③ 勒内·基拉尔《浪漫的谎言与小说的真实》，罗芄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5、16页。后文出自同一著作的引文，将随文标出该著名称首字和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

作为介体的中介又可根据主体与介体之间时间、空间或心理上的距离大小分为“外中介”和“内中介”。距离遥不可及、彼此难以接触的属于外中介，距离相对较小、或多或少可以彼此渗透的则属于内中介（《浪》：9）。堂·吉诃德摹仿中世纪骑士这类看似“追求客体，[但]归根结蒂就是追求介体”（《浪》：10）的例子就都属于外中介。

《所罗门》中，于泡沫经济中大发横财的木材厂老板大出胜，无论在社会上还是家中都是以暴力恃强凌弱之人，便成为对其敬畏有加的儿子俊次的外中介，俊次之所以欺凌同学，并非意在勒索钱财，而是因为再也没有比“像老爸一样整整那些窝囊废”（《所》1：455）更好玩的事了。而家庭中的施暴者也往往正是许多欺凌者产生的原因。

而内中介却因相对距离过近而令主体认为介体是在觊觎客体，或者可能占有、剥夺欲望客体，介体的存在由此成为主体追求欲望客体的障碍，结果主体就会从追随者转变为竞争者，并对介体怀有一种暗藏推崇的仇恨，即茂木所说的混杂了嫉妒和羡慕，却又没能转为尊敬的“嫉恨”（《浪》：10—12）。内中介越靠近，主体嫉恨的情感就可能越强烈，欲望客体的具体价值就越少，甚至任何欲望都可能令主体产生与介体竞争的欲望（《浪》：90，113）。这也令许多局外人看来毫无道理的欺凌更容易理解了。<sup>①</sup>如《时间》中春子无法忍受好友深月在不放弃社团活动，在并未全身心投入学习的情况下仍能取得比自己更好的成绩；《3年A班》中的班花唯月则厌恶濹奈可以“真挚地做着自己想做的事情，毫不动摇地活着”，而自己为筹集从事演艺事业的巨额准备金却只能去当黑社会头目的女友。可以轻而易举地获得令她们称羡的生活状态之人，便因此而成为她们各自想要除之后快的“眼中钉”。

基拉尔认为，正因对欲望的摹仿很容易生成敌对性，一旦这种敌对性失控<sup>②</sup>，就会产生“摹仿危机”，即构成社会的诸种机构、法律、禁忌，以及各种保护性的差异秩序的危机，而在无差异、等级的环境下，群体的摹仿暴力便会如同传染病一般威胁到每个人，此时就必须通过某种宗教仪式，处死一个“替罪羊”来化解这一危机，重返具有差异等级的稳定社会。<sup>③</sup>尽管近现代社会中这种牺牲献祭仪式已难再见，但替罪羊效应及

① 介体理论也可用来解释一些青少年犯罪行为的动因，如《告白》中的修哉便是直树的内中介，后者本无杀人动机，但竞争意识令被修哉羞辱的后者认为杀死修哉没能杀死的小女孩，在对方的价值逻辑中取胜才能让自己在精神上取胜。

② 正如霍布斯所说，当能力相当者皆欲得一物而不能同时享有，彼此必成仇敌，并均担心对手（联合他人）攻击自己，为求自保，各方都可能做出唯有用武力或用机诈控制一切所能控制的力量先发制人、灭尽对手方能安享所欲之物的推断，此时若无公认的权力或机制压服一切，就可能陷入“人人为人人之仇敌”的战争与混乱之中（霍布斯《利维坦》，朱敏章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0年，第58-59页）。

③ 夏尔·拉蒙《勒内·吉拉尔：欲望的本质是摹仿》，王睿琦译，载《文汇学人》2016年1月8日，<https://www.douban.com/note/533826566/> [2021-06-25]

类似的暴力运作机制却依然存在于各类文学类别及社会现实当中。<sup>①</sup>

因战后日本的门阀政治连同天皇制一起得到了保留，日本社会仍异常看重位阶、辈分、年资，日本企业中普遍存在相应的年资制度，日本校园也相应地仍隐隐存在一种金字塔式的等级差异制度，简单说来主要体现为：家境好、颜值高、性格开朗善于社交和擅长团体类运动的人，以及不良少年居于顶端；擅长单人运动和文艺类社团成员，以及顶端成员的追随者处在中端，而御宅族、书呆子、不善运动、不合群者则居于底端。<sup>②</sup>在这种校园文化中，懂得察言观色、顺应“氛围”便十分重要，有时甚至需要配合“氛围”选择自己的言行和衣着。而校园欺凌在更深层意义上就是通过牺牲某些替罪羊来不断稳固现有等级秩序：“只要牺牲一个人，要全班去讨厌，大部分人就能安心，还能有人乐在其中。”<sup>③</sup>与现实情况类似，《所罗门》等作品中校园欺凌的主导者，大多出自等级的顶端。在一次次欺凌行为中，这些主导欺凌者除巩固自己的位阶、在恃强凌弱中获得快感外，还可缓解激烈的考试竞争、复杂的人际关系及僵硬的师生、家庭关系所引发的各种焦虑与压力。

基拉尔提出，可能被人视为替罪羊的“受难标记”有很多，除了文化标记（外邦人、少数族裔、暴发户）和宗教标记（异教徒、女巫）外，还有疾病、精神错乱、伤残等各类身体上的异常标记，且“一个人的受难标记带得越多，他就越有可能大难临头”<sup>④</sup>。校园中最有可能被视为替罪羊，亦即欺凌对象的，就是处于校园等级底端中那些茂木所说的因身体或社会层面上的弱势遭受“蔑视”的学生，如外表有明显缺憾，性格懦弱、不合群的，以及“残疾、患有疑难杂症或家境极为贫困的”（《所》Ⅲ：120）。

而那些并不具有受难标记、遭到嫉恨的内中介，即便身处等级上游，一样可能在谣言的丑化、污名化中成为受害者，而欺凌这种现代“猎杀女巫”行为，可能往往是以一个略带侮辱性的绰号作为开始的。《所罗门》中特意提到了老勃鲁盖尔的木板油画《绞刑架上的喜鹊》，并强调喜欢象征和隐喻的画家当时正处在教会猎杀女巫和异端审判的高潮时期；而喜鹊在当时的欧洲常被喻为“骗子”或“告密者”，身处那种时局之人，

① 这种在恐怖电影中也非常常见的“献祭”和“献祭”失败后的“摹仿危机”，在绫辻行人充满灵异色彩的“推理小说”《替身》（2009）中，也有着更简单、粗暴、易懂的类似描写：某校某班常年选定一人作为多年前一名意外死亡学生的替身，并对其进行集体无视，一旦这种集体社交欺凌的潜规则被打破，班上学生及他们的亲属就会一个个死于非命。参见绫辻行人《替身》，成浩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

② 全球电竞网《和动漫不同的真实日本校园等级制度横行》，[https://www.sohu.com/a/125910841\\_551408](https://www.sohu.com/a/125910841_551408)[2021-08-18]而同样存在严重的校园欺凌问题的韩国，也有着相似的等级化文化成因和校园等级制度。

③ 辻村深月《时间停止的校园》（上），吕灵芝译，新星出版社，2015年，第300页。

④ 勒内·吉拉尔《替罪羊》，冯寿农译，东方出版社，2002年，第21、31页。

往往因担心受到迫害而先去告发别人（《所》Ⅲ：206—208）。借对画作的解读，宫部美雪清晰地显露了自己对校园欺凌机制的认识，同时也从侧面说明了使人污名化的谣言在这种替罪羊机制中的必不可少——深月和濑奈在遭受欺凌前均被人造谣，《时间》中因不堪欺凌而自杀的泽口也曾被人大肆宣扬如何迟钝又缺乏自知之明，没一个人喜欢。

校园欺凌的氛围中，很多学生成为欺凌的旁观者和追随者，也是因为担心遭到连累，担心下一个被欺凌的就是自己。这也是替罪羊机制中的另一特征：人们即便知道受害者是无辜的，也会因害怕被当作另一个替罪羊而噤若寒蝉。《告白》中的班长美月便因没有参与“天罚”游戏同样遭到了欺凌。《3年A班》中见到好友濑奈遭遇全班欺凌时本想挺身而出的班长，立刻就被人警告小心成为下一个，最后也只得加入到孤立她的行列中。

正如原始的替罪羊仪式总是周而复始地进行，只要校园内“摹仿危机”的焦虑不断绝，就会犹如循环往复的魔咒般，不断将新的受害者拖入到这不断升级的修罗场。甚至欺凌者本身也会因校园内等级一类内因或舆论环境的变化，沦为下一个被孤立的对象：如被春子社交欺凌的深月及其“朋友圈”本就是社团或班上的“当权派”，他们团结而成的“氛围”久而久之必然会让春子“加害者”的标签深入人心，形成舆论压力；而嚣张的俊次以往还可以凭借不良少年的身份和一身暴发户式的名牌装扮获得优越感，但一旦为千夫所指，父亲也锒铛入狱时，就只剩下“暴发户之子”“杀人嫌犯”的标记了，所以直到那时他才真正心甘情愿地求助于校内审判，希望得到正名。

### 三、校园欺凌的内外部环境：学级崩坏和格差社会

一旦发生学生校内坠亡事件，无论是小说还是现实当中，首先会被质疑的往往是学校。然而《所罗门》等作品对质疑、监督学校教育的新闻媒体似乎普遍不以为然，宫部美雪更让班长藤野凉子指责茂木记者从未真正站在学生的立场考虑他们的感受，“只是按照自己编写的剧本，利用大家当成武器，去和自己假想中的敌人战斗”（《所》Ⅰ：578）。相比之下，这些作品对学校的描写便宽容许多，《所罗门》中以津崎校长为代表的校方并未像茂木怀疑的那样为学校声誉故意隐瞒真相，其举措失当之处在于未能进一步深究卓也自杀的原因，以及明明通过心理咨询发现了杜撰目击俊次杀害卓也伪证的是曾被俊次等人欺凌的女生三宅树理，却担心曝光会给树理带来伤害而秘而不宣，而从未想到应及时倾听树理的心声，这才导致媒体掀起轩然大波，反将全校卷入漩涡之中。

但正如社会派推理习惯于为犯罪行为找到社会环境的促发原因一样，在校园欺凌等一系列问题上，对于一些教育史研究者来说，较之这种具体处理层面的失当，学校及

其背后整个教育体系更深层次的失误，也许在于长时间实施“有名无实”的教育体制自由化改革（1984至2000年）<sup>①</sup>：一方面是各种自由、放宽、弹性政策可能导致学习进度不佳甚或全无进度，另一方面对升学率、高分率、偏差值等数据的过分重视，又让学校教育偏重传授书本知识而忽视正确价值观的传递，进而出现了1980年代中期便开始出现表征，到90年代末至21世纪初普遍被公众认为是老师无法掌握学生的“学级崩坏”年代。<sup>②</sup>《所罗门》中开设校内审判的学生真正忍无可忍的，也是校方不能信任他们，以照顾他们的名义隐瞒实情，甚至就连卓也的自杀也与对学校教育体制的失望不无关系。这种学级崩坏的后遗症也许至今都仍存在——《告白》和《3年A班》的开头，都是学生们对班主任不管不顾、自行其是的纷乱模样。而一旦师道尊严的等级规则被打破，校园内部的学生等级制度就可能会愈发大行其道。所以，尽管对于欺凌问题日本一直在不断推出必要的应对措施、法案，学校和整个教育机制也一直在采取相应的综合性措施，这些都值得肯定和借鉴，但见招拆招式的措施却又的确存在难以及时应对新变化（如在应对网络欺凌的新情况方面）的情形，容易陷入治标不治本的窘境。

对于同样对学生的成长造成深远影响的原生家庭，与宫部美雪作品对各类家庭问题细致入微的描绘相比，随着所描写年代的时光流转，其他作品中对学生家庭的呈现却出现不断减少的趋势，除创作者写作风格和理念不同，以及戏剧冲突方面是否需要等因素外，其实也可视为社会环境变迁在家庭中的某种映射。新世纪初十年，凑佳苗、辻村深月的作品中父亲的形象明显淡化，不过仍有形象相对鲜明的母亲。<sup>③</sup>到了临近2010年代末的《3年A班》中，父母们大多体弱多病或经济困窘，甚至沦为符号化的存在。

1990年初，日本股市泡沫虽已崩坏，但土地价格的上涨势头仍未停止，《所罗门》中意图靠毁掉老宅再建新宅、在房地产经济中殊死一搏的大出胜不会料到，即便他没有因雇人纵火造成老母惨死的人伦惨剧，迎来的也将是“失去的十年”，甚至二十年<sup>④</sup>。

① 臧佩红《日本近现代教育史》，世界知识出版社，2010年，第327页。

② 安德鲁·戈登《现代日本史：从德川时代到21世纪》，李明津译，中信出版社，2017年，第21、516-517页。

③ 经济衰退中，多数家庭中的父亲要面对更加严酷的职场，所以在两人的小说中即使出现，也大多会像凑佳苗的《夜行观览车》（2010）中那样，对子女的教育采取逃避或放任自如的态度。母亲则面临更复杂的选择，无论是做家庭妇女，还是坚持事业，甚或成为新世纪离婚大潮中的单亲母亲，都会有各自的辛酸。尽管如此，母亲仍大多在教育方面付出更多心血，甚至会出现《告白》和《夜行观览车》中那种因孩子成长不符合期待而采取过激行为的母亲。

④ 有研究者认为，从2003到2008年初，日本失业率不高，人均收入有轻微但持续不断的提升，所以用第二个“失去的十年”来形容21世纪初的日本有失公允（安德鲁·戈登《现代日本史：从德川时代到21世纪》，第547页）。但实际上这一时期实现增长的行业主要是IT业、金融业等（橘木俊司《格差社会》，丁曼译，新星出版社，2019年，第84页），实体经济发展相对缓慢得多，在美元霸权和日本金融贸易自由化的背景下，随着金融业的动荡，无论是新贵还是中产，稳定性都不会很强。

在经济大衰退中，原本的中产之家被快速分化为新的富裕层和贫困层，这样的“格差社会”<sup>①</sup>既为校园等级制度提供着背后的支持，又为其不断施加等级失序的焦虑<sup>②</sup>，而格差社会中的冷酷现实，本身也会成为校内等级制度摹仿的“模本”。社会环境影响着家庭，而沟通不足、关系隔阂以及种种偏颇的教育方式又会令孩子性格孤僻内向，从而或是因不合群而被打上替罪羊的受难标记，或是干脆选择对比自己更加弱小的人实施欺凌。而由此加重的校园欺凌、不登校等问题，事实上也正在反向影响着社会环境。

《告白》中曾提到社会上出现了一种被称为“不去学校也不去工作、在家中无所事事”的“尼特族”<sup>③</sup>。据统计，进入新世纪后，日本尼特族每年都处在五六十万人的高位状态；遭遇欺凌而不登校的学生中相当一部分会难以按期毕业、取得学位，对复杂人际关系的恐惧也会导致他们难以承受长期聘用工作的压力，更难承受职场上同样可能出现的欺凌，其中一部分便会就此选择成为尼特族。<sup>④</sup>尽管进入21世纪后，也开始出现《镜之孤城》中扮演举足轻重作用的“孩子不去上学以后，不知所措的父母首先会去那儿寻求帮助”的“自由学校”<sup>⑤</sup>，为因欺凌等原因不登校的学生提供基本教育和交流场所<sup>⑥</sup>，但其长远作用仍有待观察。何况，在学校里被孤立而选择不登校的人姑且还有这类民间机构援助，可在社会上“不登校”的尼特族，一旦脱离社会，就再难回归，待到四五十岁时，他们便“难以成为通过雇佣政策和关怀活动来防止孤立的对象”，不婚、无子、无业，便会在这一“无缘社会”中逐渐“滑落到各种公共支

① 这一概念由日本社会学家山田昌弘在《希望格差社会》一书提出，“格”为等级、阶层之意，“差”为差距；“格差社会”即指日本阶层日益固化，在消费、资产、信息或教育机会的获得，甚至主观意识等方面的差距日益扩大的社会状态。参见山田昌弘『希望格差社会—「負け組」の絶望感が日本を引き裂く』、盐尻：筑摩書房、2004年。

② 就读教育资源优于公立学校的私立学校，参加口碑好的培训班，或在校内教育之外进行精英化培养，除了学生的学习能力，往往也需要财力和社会地位的支撑。一旦旧富裕层失势，或新富裕层崛起，校内外等级都可能随之改变。勉强挤入更高的等级中，便有可能像《夜行观览车》中的远藤家那样，因出于虚荣住在高档住宅区“最小的房子”里，女儿便在学校遭遇了欺凌，全家也都成了在等级序列的坡道上勉强支撑，随时可能因一点压力便跌倒的“坡道病”患者（凌佳苗《夜行观览车》，闫雪译，湖南文艺出版社，2021年，第286-287页）。

③ 凌佳苗《告白》，丁世佳译，哈尔滨出版社，2010年，第83页。“尼特族”来自英国创造的概念，即“Not in Education, Employment or Training”（无教育、无雇佣、无进修）之首字母缩写“NEET”的音译。在日本主要指完成义务教育后，15至34岁间不上学、不就业也不做家务的青年，又被称为“蛰居族”“茧居族”，甚至被我国意译为“啃老族”“家里蹲”。

④ 在动态的统计中也不难发现，“高”年龄段的尼特族人数在不断增加，学历也普遍偏低；另一部分则会选择成为从事非正规雇佣的“飞特族”（Freeter，日语为“フリーター”），即没有稳定工作方式，靠打短工生存的人（郗汀洁《21世纪日本啃老族问题剖析》，载《当代青年研究》2018年第3期，第124页）。

⑤ 辻村深月《镜之孤城》，李大鸣译，浙江文艺出版社，2020年，第154页。

⑥ 日本政府也在努力帮助这类自由学校转型为财团法人，以便获得补助，并使就读的学生同样能获得有效的学位证明（《日本“自由学校”集合“不登校”学生》，载《新民晚报》2018年11月15日，第21版）。

援的夹缝里”<sup>①</sup>。而那样的人生轨迹，无疑将会是这个愈发缺少壮年劳动力的国家最悲哀的成长故事。

#### 四、青春残酷物语中的三种成长模式

凑佳苗在其《少女》中，曾将遭遇欺凌的受害者心态比喻为一种类似“暗夜走钢丝”时唯恐堕入无尽黑暗的迷茫无助。事实上，在日本社群式集体主义观念的耳濡目染之下，很多人在遭遇由他者构成的集体的恶意时，首先质疑的往往是自己犯了什么错导致了欺凌，文中论及的这些青春残酷物语中，害怕走出家门、幻听、精神分裂等种种“病症”，既是试图远离欺凌伤害的心理使然，更是这些孩子陷入到自我的孤城之中的写照——正如《镜之孤城》这一书名的喻意所示。不止受害者，实施欺凌者也很可能会因习以为常的施暴而在长大后成为家暴者、酗酒者、滥用药物者；欺凌的旁观者，可能会像《时间》中的白召彦一样因未能及时发现并制止同学泽口遭遇欺凌而始终生活在自责之中，或因受到惊吓而感到焦虑或抑郁。从这个意义上说，所有牵涉欺凌的人都可能陷入自我的成长困局之中，甚至一生都难以摆脱。

源自德国的“成长小说”（Bildungsroman）文类概念传入日本后被称为“教养小说”，无论是西方源流，还是日本的本土化创作，这些成长小说均包含有个体在成长过程中实现自我的人格完善及在社会经历中接受教育之意。<sup>②</sup>较之近现代的成长小说更多偏重对主人公社会认知和教育性的体现，当代的成长小说更多展现对独立而又软弱的自我之认知，以及自我如何在保有个性化的前提下立足于社会的历程。<sup>③</sup>包含推理文学在内的描写校园欺凌这一题材的作品，其实完全可以视为一种别样的成长小说。比如文中作品在叙事中大多包括“主人公成长的躁动、环境的考验、困境中的迷惘、顿悟和拯救”<sup>④</sup>等主要环节或事件，而《所罗门》《时间》《3年A班》这三部作品中，使欺凌事件中的学生们实现“顿悟和拯救”的均是带有审判意味的环节，但又展现出三种变奏。

《所罗门》中的这一核心环节，是凉子等人组建的校内审判。法制化、社会化的模拟法庭不仅查明了卓也自杀的真相，让俊次幡然悔悟，让欺凌受害者树理的心声得到了

① NHK特别节目录制组《无缘社会》，高培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年，第105页。

② 参见陈婷婷《教养主义的呈现与日本成长小说的流变》，载《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1期，第19页；孙胜忠《成长小说的缘起及其概念之争》，载《山东外语教学》2014年第1期，第77页。

③ 孙胜忠《英美成长小说情节模式与结局之比较研究》，载《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第233页。

④ 芮渝萍、范谊《认知发展：成长小说的叙事动力》，载《外国文学研究》2007年第6期，第30页。

倾听，也令所有参与校内审判的学生们得到了成长上的质变。这也符合如是规律：在欺凌行为中愿意勇敢站出来的学生，也可能会为其成长带来积极影响。从作者借凉子母亲之口将组建校内审判法庭时的凉子等人比作黑泽明经典电影中仗义拔刀的“七武士”，到颇有深意地让担任辩护人事务官的健一在2010年回到母校担任老师，让凉子以律师的身份在时间线设定为“3·11”震灾后的短篇小说《负解方程式》中再度登场，这些设定或许都是试图在表达这样一种期待：经历了校内审判的自我和社会认知的“启蒙”，这一代成长于“失去的十年”中的年青人，在又一次日本的“国难”来临时，已成为可以继续担负社会责任的栋梁，继续为下一代和寻求社会公正而奋斗。这种“时代与人”式的成长思路出自被誉为“松本清张的女儿”的宫部美雪之笔，并不令人意外。

《时间》中提供自省式审判场所的则是割腕重伤的深月濒死时用精神力量所构筑的异世界，在那里，她让软弱自责的自我与一众好友一起接受由她分裂出的强势自我的审判，进行各自的自省。而这个“时间停止的校园”和辻村笔下另一处异世界“镜之孤城”，均带有明显的轻小说风格（《时间》很快就被改编为轻小说出版），这也是新世纪日本推理文学更加多元化的一种表现。这两部小说提供的成长模式也因此彻底远离了昭和后期的动画文化中那种左翼批判色彩，而与平成时代（尤其是新世纪以后）的轻小说、动漫一脉的青少年亚文化所提供的成长模式十分相近：在时空超越、平行宇宙、虚拟世界、赛博朋克等异世界逻辑，或量子力学之类看似科学的伪科学逻辑中，主人公及与之存在“羁绊”<sup>①</sup>的好友一起面对千难万险，共同找回迷失的自我，重获新生。

而《3年A班》中创造审判环节的则是绑架全班学生的柊老师用胁迫、诡计创造的特殊课堂。在柊看来，学生们“道德缺失，嘴上宣扬个性，内在却是一具空壳”，为了这些“只能看到未来三步之内情况”的未定型之人，身患绝症的他不惜以犯罪的方式来教育他们。这位有着异乎寻常激情的老师或可被视为自1990年代就在影视剧中层出不穷的“热血教师”形象的变体，这类形象可见于《麻辣教师GTO》《极道鲜师》《女王的教室》《龙樱》等作品中，他们或是曾经的问题少年，或在教育过程中动用极富争议的手段，但都致力于让学生们重新认识自我、学会理性思考和负责任地生活。而这些形象大多诞生于学级崩坏的年代也许并非偶然：失去信任的教师想要在自我认知和社会认知上给予学生们必要的教育，不妨考虑不走寻常路，或以毒攻毒，或在亚文化层面上重新接近学生们。也许正因如此，在相当一部分改编自动漫作品的热血教师叙事中，包括辻村

<sup>①</sup> “羁绊”系目前国内对日语“绊”（きずな）的常见翻译，多用于表示人与人之间弥足珍贵的情感联结，二次元文化中的羁绊具有相当可观的代偿作用，因而能深深打动许多有强烈情感需求的二次元文本爱好者。参见邵燕君、王玉玉主编《破壁书：网络文化关键词》，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第39-41页。

的两部作品中，都有类似柊一样努力与学生们建立“羁绊”、共同成长的教师形象<sup>①</sup>。

三种模式中，其实只有宫部提供的“社会派”路径是真正由学生自发进行的改变，并且让中学大部分学生类型的代表都参与到校内审判之中。轻小说化的模式则最为脱离社会现实，新世纪动漫中较之辻村深月笔下的更为常见“平成废柴”“弱者逆袭”的叙事套路，其满足情感需求的代偿作用远大于现实中实际操作可能，不过，这一模式对于“羁绊”的追求却也不能因此仅仅被视为“心灵鸡汤”而轻易忽视。热血教师模式虽在教育作用上兼具社会性和感染力，可现实中若有人想要仿效，恐怕甫一动手，就要受制于日本教师不得体罚学生的铁律，或像《告白》中盲目摹仿偶像“劝世鲜师”的青年班主任“维特”一样黯然收场。不过，这至少证明了只是照本宣科、将学生视为商品或服务对象的教师是无法取得他们信任的，更难以帮助他们走出成长的困境。

况且，现实中即便真有人借校内审判一类契机，成长为社会剧变后仍能扛起社会责任的栋梁，也不能阻挡他们的同龄人中有更多人成为下一代人生活中因困顿消沉而逐渐缺席的父母，或是崩坏课堂上的老师。平成三十年以来的现状证明，若不能及时更新对校园欺凌的认知并推出应对法规，不能改变等级森严的校园文化，不能尽可能淡化格差社会、阶层固化对校园的负面影响，不能由校园和家庭共同寻得合适的方法教导学生们正确地理解自我、死亡、尊严、同理心，鼓励他们建立平等互动的伙伴关系，及时疏解他们心中的各种压力和焦虑，校园欺凌一类社会问题便总会以新的复杂形式不断出现，并造成越来越恶劣、深远的影响。文学世界提供的不同成长模式，虽终究只是文学的慰藉与慈悲，不足以改变教育资源的不平等，更不能改变格差不断增加的社会现实，但它们所展现、剖析的问题却不容忽视，如何及时为身处种种困境中的未成年人创造成长的契机，想来也绝非仅仅是已步入令和时代的日本社会需要去认真思考的教育难题。

**作者简介：**王涛，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副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为当代西方文论、比较文学。近期发表的论文有《中性、沉默与介入之争，或理论革命的一段前奏》（载《东吴学术》2019年第6期）。

**责任编辑：**苏永怡

<sup>①</sup> 《时间》中与深月等人一道困在深月精神世界中的菅原，其实正是班主任榊老师在这个异世界中的“年青版”投射；《镜之孤城》中鼓励、帮助了安西心等多个时代不登校小伙伴的自由学校女老师喜多岛，其实正是长大后的水晶。这两位和主人公一起成长的热血教师，都是曾经的问题少年。